

杜国庠传略

黄学盛 熊泽初

杜国庠是老一辈的革命活动家，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优秀共产党员，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一

1889年4月30日，杜国庠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莲阳乡兰苑村。父亲杜建珪是晚清秀才，以教书的束脩养家糊口。杜国庠5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生活更加困苦。幸嫡娘勤劳慈惠，省吃俭用，使他得以在7岁进入私塾，受到了严格的启蒙教育。

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东北爆发战争。腐朽的清王朝任由豺狼蹂躏国土而宣布中立。15岁的杜国庠对此深感痛心。他在一篇策论里，极力主张彻底收回东北主权，表达了强烈的民族感情。私塾先生的友人吴冠英（后改名吴贯因，别号柳隅），具有爱国爱民思想，他看了杜国庠的文章，极为赞赏，主动提出要杜国庠到他那里免费就读。

在柳隅先生的指导下，杜国庠开始接触到当时上海出版的报纸杂志，受到新思想的启迪，眼界渐为开阔。不久，柳隅把他带

到县城，参加专为考生补习算学的传授班学习。

1907年，学业成绩优异的杜国庠，得杜氏大宗祠及邑同善祠的资助，前往日本留学。到东京后，杜国庠先参加了短期的日语补习。1908年，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普通科。具有民主思想的杜国庠，非常关注日本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活动。他在吴冠英编辑的《宪政新志》上，发表了《咨议局记事》、《列国国产税制度概要》等多篇文章，为各省咨议局参政提供资料。1910年2月，他试译了日本法学博士美浓部达吉的《耶里匿克氏宪法变化论》，登载在《宪政新志》第六号上，这是杜国庠的第一篇译作。

1912年，杜国庠考进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6年9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学制3年。这期间，清王朝虽已垮台，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是军阀割据，民不聊生。身居异国的杜国庠，心忧社稷，积极参与当时的进步社会活动。1916年，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复辟帝制，全国人民群起声讨。杜国庠与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1913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等人，在东京筹组丙辰学社，进行反袁斗争。

在日本留学期间，杜国庠兴趣广泛地涉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字学、佛学、因明学（印度逻辑）和哲学。这些，为他后来研究古代思想史打下了基础。但是，一切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方法论，都不能使他满足。1916年9月，杜国庠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在帝大的第一年，他有幸聆听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博士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写下了学习《资本论》的读书笔记。在初步认识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是学习了作为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后，才使他多年所探求的方法论问题，得到解决。从此，确立了从事革命运动和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生道路。

留学期间，杜国庠结识了先后赴日留学的郭沫若、彭湃等人，共同的革命志趣和执着的学术追求，使他们成为挚友。在东京，杜国庠还曾同赴日求学的周恩来（1917年9月到日本，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19年4月回国）几度会晤，彼此间建立了可贵的革命情谊。

二

1919年7月，杜国庠在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取得经济学士学位。回国后，经李大钊介绍，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政党论、社会政策、工业政策等课程。还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平民大学等校兼课。

杜国庠在北京期间，曾和平民大学的教师李春涛等，合住在地安门内慈慧殿南月牙胡同18号“赭庐”。就在这个小天地里，杜国庠组织大家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来往“赭庐”的那些人中，有国会议员胡鄂公、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周鲠生、广东早期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彭湃等。

1924年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逝世。杜国庠参加了在北大法学院举行的追悼大会。会后，他在和李春涛、邝摩汉等创办的《社会问题》杂志中，编辑出版了纪念列宁专辑。杜国庠在该刊上发表了题为《列宁与第三国际》的文章，热情洋溢地讴歌了列宁和他所建立的第三国际的伟大功绩。

1925年春，杜国庠深感当时的北京大学，风气腐败，非栖身之所，便乘奔母丧之机，辞去一切教职，回到了家乡澄海县。

三

1925年6、7月间，澄海县立中学校长辞职，校董会一致公推杜国庠继任。8月，正式到校视事。他首先着手的一件事，便是破除封建礼教的陋规，破例招收了吴文兰等6名女生，开创了男女同校的新风。他支持进步教师李春蕃（即柯柏年，当时已是共产党员），带领高年级学生，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海丰县参观学习。还亲自组织进步师生到城西的基督教堂，现场揭露帝国主义利用传教自由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向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是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胜利进抵潮汕，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出任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委员，主管东江（辖潮汕、梅县、惠阳三地区）20余县的政务。杜国庠奉周恩来之命，改组了国民党澄海县党部，使左派势力大大加强。

杜国庠领导澄中的半年中，锐意改革校政，让学生走出校门，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造就了不少革命人才。在招收的6名女生中，有5名不久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中的吴文兰，1926年擢任中共汕头地委妇委书记、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汕头分会会长，成为潮汕妇女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和组织者。还有曾经担任中共澄海部委书记（后改称县委）的林灿，曾任东江特委副书记和广州市委书记的杜式哲等。

1926年12月，潮汕地区的金山中学发生了进步师生驱逐反动校长黎贯的风潮。杜国庠奉周恩来主任之命，接任金中校长。他大力整饬校政，撤换反动教员，彻底清理被校董、绅士左右的金中积欠校产，组织学生轮流下农村参加农民运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4日深夜，汕头、潮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跟着行动，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国庠幸得一位工友报讯，才免遭毒手，避匿乡间。

9月下旬，南昌起义军进驻潮汕。杜国庠立即赶到汕头会晤周恩来和郭沫若。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他毅然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他恳切地向周恩来表示：“目前是革命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应吃苦，我希望党允许我加入，给我更多的教育。”周恩来高兴地答应提交汕头市委讨论，并准备让他出任建立革命政权后的潮阳县县长。

由于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起义军在潮汕很快遭到失败。杜国庠随总指挥部撤出汕头，在普宁县的流沙镇附近被敌军冲散，辗转到了海丰境内。当地农民听说他是彭湃的朋友，热情地加以接待和安排。10天后，用小船把他送往香港。

四

1928年1月，杜国庠到了上海，2月，由钱杏邨（阿英）、蒋光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我国文化战线上，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顽强地奋斗了一生。

一到上海，杜国庠便投身于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他参加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又和洪灵菲、戴平万等组织“我们社”，创办《我们》月刊。从1928年初到1930年中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国庠着力于革命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翻译。在文艺理论方面，他选择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底基础》、柯根的《无产阶级文学论》、《理论与批评》

和藏原惟人的《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普罗列塔利亚艺术底内容与形式》等。翻译的小说，主要是当时日本的左翼文学作品。先后编辑成册的有《一束古典的情书》、《俘虏》、《废人》等。

在1929年3月23日出版的《海风周报》第十二号上，发表了杜国庠的《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这是一篇论述文艺大众化的论文，该文提出了“大众化”、“新写实主义”、“艺术运动的二重性”三个问题，批判了当时的一些错误言论。

杜国庠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同时，并没有放松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译著和研究。也就是在这几年间，他用林伯修、吴念慈、林柏等笔名，翻译了德波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亚克色利罗德的《社会学底批判》、雅各氏莱夫的《普列汉诺夫论》、佐野学的《旧唯物论底克服》、《无神论》，还翻译了《金融资本论》。这7本书，洋洋80多万字，分别由上海南强书局、晓山书店和创造社出版部出版。此外，杜国庠还和柯柏年合译了乌连诺夫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又同柯柏年、王慎名（王心民）合编了《新术语辞典》和《经济学辞典》。这些重要译著和辞书的出版，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知识青年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起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1929年秋，我党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直属中宣部领导。杜国庠是文委成员之一。文委成立以后，立即筹组左联。他积极参加了这方面的活动，出席了1930年3月2日召开的左联成立大会。随后，他按照党的指示，于1930年5月与潘梓年、邓初民等发起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参与社联党团的领导工作。

随着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开展，继左联、社联之后，又

成立了剧联、美联等左翼组织。在此基础上，党又成立了一个公开领导这些群众团体的机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实际上，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左翼文化总同盟，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文委成员之一的杜国庠，也是文总的一位负责人。

1931年初春，在二十五路军梁冠英部担任总参议的著名共产党员宣侠父，到上海找左联的负责人，要求派一位同志到军中协助他做政治思想工作。文委认为，杜国庠是搞社会科学的，又是一位极为细心的人，肩负此任最为合适。于是，杜国庠化名林伯修，随宣侠父到二十五路军驻地淮阴，在梁冠英军中办起了社会科学研究室，经常组织进步军官学习《社会科学讲话》等书籍，传播革命影响。1932年初夏，蒋介石命令二十五路军进攻鄂豫皖苏区。宣侠父极力劝阻梁冠英无效，愤然离军。杜国庠也因之回到上海，继续参与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工作。

在此后的几年间，杜国庠把全部精力放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和对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培养上面。他先后参加了文总的机关刊物《中国文化》和《正路》的审稿工作，还经常为《研究》等刊物写稿；他通过由陈卓凡出资，以王鼎新为经理的南强书局（陈、王都是澄海县人，留日学生），出版了许多社会科学丛书和进步文学作品。南强书局的出版计划和稿件，多由杜国庠审定。许多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和作家，如邓初民、柳岛生（杨贤江）、吴黎平、李达、沈端先（夏衍）、钱杏邨等的著述，多由南强书局出版发行。他经常参加一些大学和工厂组织起来的学习小组和读书班的活动，孜孜不倦地指导他们学习。许涤新回忆说：“杜国庠经常出席我们所组织的读书会。他要我们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作为学习的主要读物。但是，我们对恩格斯在书中所提出、所发挥的问题，总是搞不清楚。而杜国庠呢？总是耐心地给

我们解释。因为工作忙，来不及吃饭，他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时，经常买两个包着玻璃纸的小面包，一面吃，一面讲解。”

杜国庠是一位独具慧眼的“伯乐”，他能发现“千里马”，并为其架设通往成功之路的桥梁。艾思奇即其一例。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27年和1930年曾两度赴日求学，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学有所成。1932年在上海泉漳中学任教期间，开始以“思奇”、“李东明”等笔名，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哲学短文。1933年夏，文总负责人杜国庠到泉漳中学了解斗争情况。发现他思想活跃，学习勤奋，有较好的理论基础，认定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应该发挥他的长处。于是，便派社联的蔡馥生与他联系，将艾思奇的关系转到社联，使他有了充分的时间研究哲学，不久，艾思奇由杜国庠和许涤新介绍，正式加入社联，并担任研究部的工作。从此，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和著述上，努力奋斗了一生，成为我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除参加文委、文总和社联的领导工作外，杜国庠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参与党的机关报《红旗日报》的编辑工作。

五

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成立了上海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

从1933年底至1935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中央局三次遭到敌人的大破坏。在1935年2月19日的第三次大破坏中，杜国庠与文委阳翰笙一起被捕，在其他地点同时被捕的，还有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文委田汉等36人，关押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

经过多年地下斗争锻炼的杜国庠，对于敌人的搜捕，早已有

了思想准备。他说：“当被捕的那一刹那，有十几分钟为了编口供而着急。准备好了，便觉泰然，转而生起瞧他们把我怎样的好奇心。这时，我那些英勇牺牲的学生如吴文兰等，也浮现在我的眼前，觉得我应该对得住他们。因此，我除了写姓名——吴啸仙（被捕后用这个名字，因为我曾用这个笔名译过一本书，准备万一被捕时用的），打指模之外，什么也坚决不写，不承认是共产党员。”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警方提审犯人，杜国庠在走廊下与田汉相遇，彼此才知道对方被捕。杜国庠深情地凝望着田汉，并在他手心上写了“坚决”二字。这两个字，既是对自己斗争意志的表白，也是对田汉的勉励。田汉会意地点点头，于狱中填下《虞美人·狱中赠伯修》一阕，以表达自己的心声和回报杜国庠对他的激励。

不久由于叛徒告密，警方知道了杜国庠就是有名的文人林伯修，便伪装客气，说只和他谈“政治”，不谈“关系”。杜国庠针对敌人的心理，决定以缓对急、以笑对怒、以柔克刚，用打太极拳的策略来对付敌人。在审问中，敌人多次进行反动宣传，妄图使杜国庠改变观点。杜国庠说：“我40多岁了，要改变自己的气质，怕也要30年吧，急是急不来的。”言词诱说无效，敌人遂以用刑进行威胁。杜国庠微笑着回答：“吃苦头也不算什么，打到发昏，便不觉得痛了。”当敌人恼羞成怒、大声叫骂时，杜国庠便以轻蔑的冷笑对之说：“权在你们手中由你，假如在我们手中便由我，杀便杀，发脾气对于彼此都不合卫生。”

3月17日，杜国庠被调到另一囚室。这天，正是巴黎公社革命64周年前夕，同室难友知道他是林伯修，就请他做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为了鼓舞士气，杜国庠高兴地答应了。3月18日上

午，他以巴黎公社的报告结束了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囚禁生活。当天深夜，在滂沱的大雨声中，与黄文杰、朱镜我、田汉、阳翰笙等8人，一同被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后在这里被关押了5个多月。

1935年初，杜国庠又被解往苏州反省院，在那里关押了将近两年时间。苏州反省院把杜国庠、李初梨、彭康、章汉夫、廖茂华、丁瓚、李默农等20多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编在“研究班”，要他们研读三民主义和陈立夫的《唯生论》。指定杜国庠要写出研读《唯生论》的论文。杜国庠趁机要求院方购买包括唯物论著作的日文书作参考。院方只给了几本就不给了，却一再催索论文。杜国庠拖了一年多，才交出一篇题为《中国哲学上对于“生”的看法》的文章，有3万多字，其中十分之九写的是中国唯物论哲学关于“生”的看法，十分之一照抄《唯生论》的某些词句。院方训育科长梁某看后质问：为什么不加评论？杜国庠说：“《唯生论》实在是经不起批评的，依我看还是这样的好。如若批评，势将体无完肤。”

杜国庠在苏州反省院后期，国民党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前来探望。刘某也是潮汕人，杜国庠在金中当校长时，他任潮安县长。刘某劝杜国庠“写点东西，表示悔意。”杜国庠说：“我要是愿意写东西，早在南京就出去了。而且，我无过可悔，更不愿意驱壳出去而把灵魂留在院内。”

1937年6月12日，杜国庠结束了两年多的狱中生活，终于重见天日了。恰巧在他出狱的那一天，阿英从上海来苏州买书，两人在路上相遇，彼此喜欢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阿英告诉他，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安事变后，经过我党斗争，国民党同意释放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同意实行共同抗日。杜国庠这才明白了释放他的真正原因。

六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转入全面抗战。杜国庠按捺不住满腔激情，迫切希望走上抗日的第一线。8月初，经熟人介绍，他到了抗日将领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军法科当上尉书记。9月，陈诚派代表面晤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请郭代为组织几支战地服务队，到军中开展宣传工作。这件事，周恩来曾在庐山与陈诚谈过。郭沫若与上海党组织负责人商量后，决定由杜国庠、钱亦石、夏衍三人负责组织工作。9月25日，在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中成立了一个战地服务队，队长是领授少将军衔的钱亦石，队员有左洪涛、张健甫、石凌鹤、刘田夫、何家槐、孙慎、林默涵、杨应彬等30多人。战地服务队中，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左洪涛任书记。稍后，杜国庠被调到战地服务队任上校总务科长，协助钱亦石工作。12月，钱亦石离队到上海治病（不久病逝），由杜国庠代理队长。

战地服务队在江浙的浦东、嘉兴、杭州、江山、金华等地城乡开展民众宣传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4月间，张发奎筹组第二兵团，把战地服务队调往武汉。杜国庠先期到达武汉，向党中央和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等作了汇报。当时，特支中有些党员要求去延安。周恩来勉励大家说：你们都是党员，要服从党的需要，党要你们去哪里就去哪里。杜国庠遵照党的指示，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周恩来等为副部长）第三厅工作。

第三厅是1938年4月成立的，主管军中宣传，由郭沫若出任厅长。它是抗战初期国共第二次合作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

物。三厅的工作，实际上由长江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当时，国统区的一大批著名文化人，如胡愈之、张志让、洪深、田汉、阳翰笙、范寿康、董维健、冯乃超、史东山、叶君健、冼星海等，都在三厅任职。我党在三厅领导干部中，单独成立党小组，成员有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田汉、阳翰笙，直接由周恩来领导。下面成立党的基层特别支部，由冯乃超负责，领导干部小组和特支分开，党组织全是秘密的。

三厅设立三个处，分管动员、艺术宣传和国际宣传。杜国庠任国际宣传处——第七处第一科科长，负责设计和日文翻译。该处名义上由副厅长范寿康兼任处长，实际上是由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主持工作。杜国庠为开展对日宣传工作，日以继夜地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1938年7—8月间，日机连续轰炸武汉，政治部决定一部分人预先撤往衡山，三厅也不例外。当时，周恩来与郭沫若认为，杜国庠有与国民党周旋的经验，决定由他负责这项工作。8月13日，杜国庠率领三厅大半人员，连同孩子剧团，前往衡山。到了衡山，杜国庠把各项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在他的指导下，孩子剧团也大有长进，到长沙、衡阳、湘潭等地宣传演出，大受群众赞扬。

随着武汉失守，长沙大火，敌机滥炸衡山，三厅全体人员又于11月南迁衡阳。1939年初，三厅又从衡阳经桂林撤到重庆。由于在撤离武汉前，已有一批人转移去新四军，有一些人到了延安，到桂林后，又分出了一部分，所以，这时的三厅人员已大为减少，由原来的三处九科改为四个科。由于三厅的大部分人员驻在乡下——赖家桥全家院子和三塘院子，杜国庠负责乡下部分的工作，实际上为郭沫若挑起了最重的担子，郭沫若后来曾说：“三厅

内部工作和应付国民党的事，主要由杜老承担。”

七

随着第三厅工作的广泛开展，蒋介石越来越感到这是扎在他心脏里的一颗钉子，想方设法，务欲除之而后快。1940年秋，蒋介石手谕：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三厅。当局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在三厅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摆上一张加入国民党的表格，要大家填写。郭沫若对此气愤填膺，针锋相对地抗议道：“入党不入党（指国民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当场打电报向当局提出辞职。郭沫若的言行极大地鼓舞了三厅全体进步人员的斗志，杜国庠等40余人也立即提出辞职。没隔几天，蒋介石突然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等三厅主要负责人。蒋介石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接着，蒋的机要秘书李维国在另一间会客室里，谦恭地对大家说：诸公都是学问渊博的知名之士，委员长的意思，是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宗旨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现在研究工作也很重要。仍请郭先生主持，诸公参加，这样也就是离厅不离部嘛！

1940年10月1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郭沫若出任主任委员，文工会名义上虽属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机构，而实际工作仍继续在我党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进行。文工会设10名专任委员和10名兼任委员，杜国庠是专任委员之一。

成立文工会时，周恩来计划要建立一个编译社，让杜国庠负责这项工作，指示杜国庠在文工会里不要担任行政工作，只挂一个委员衔头。3个月后，发生了皖南事变，白色恐怖日益严重。

周恩来指示山城的进步文化力量，要适当疏散。杜国庠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准备取道香港，前往仰光办报，向海外侨胞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

1941年3月，杜国庠抵达香港，因国民党当局不发给出国护照，只得暂留，在友人杜之绅开的行铺“毛绒社”楼上，办了一间孟夏书店，出版了郭沫若的《羽书集》等6种书刊。开业约有半年，卒因日本占领香港而关闭。

1942年春，杜国庠随同难民撤离香港，徒步跋涉，回到澄海。不久，又绕道韶关、桂林、贵阳返回重庆，继续担任文工会的委员。

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文工会的各项学术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成立了读书会，经常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杜国庠作过《公孙龙子》、《明末清初顾、黄诸大师的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学中的几个重要的问题》等学术讲演。这时，摆脱了其他事务的杜国庠，集中精力，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先秦诸子的研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整理祖国的文化遗产，写出了许多论文和札记，这些文章，大多以杜守素、杜柏、杜惑等笔名，发表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报刊上。

杜国庠在先秦诸子的研究中，最精采者在于对名辩及荀子的论述。名家与墨辩向称难懂之理，而经过他的爬梳抉剔，把这个“浑沌”凿开了。他指出墨经的“存”，不同于名家公孙龙子的“藏”，墨经用乘白马为乘马这种常识，识破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这种诡辩。这在学术研究中是个开创。他写的关于荀子的一系列论文，如《荀子从宋尹黄老学派接受了什么》、《论荀子的〈成相篇〉》、《荀子对诸子的批判》等，独辟蹊径，是对研究先秦学术史的一大贡献。他还指出，战国末叶，先秦诸子都有批判总结一代学术的

活动，成为当时的一种倾向，如庄子的《天下篇》、韩非子的《显学篇》等都是。这是学术史理论方面的极有价值的建树。

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思想的研究中，杜国庠发掘了杨王孙的《论死》、杨泉的《物理论》、范缜的《神灭论》等唯物论、无神论思想的宝贵遗产，这与他发掘先秦墨家和荀子的唯物论，同出于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光辉传统的目的。他又批判地总结了魏晋清谈。

杜国庠在《论“理学”的终结》一文中，用翔实的材料讨论了自北宋以来至明清之际历时数百年的“理学”的发展。他论述了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的反理学思想，也论及费燕峰的反理学思想。指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理学的批判，并由此指出理学无可挽回地终结了。

杜国庠论述“理学”的终结，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深意乃在于批判现代理学的借尸还魂。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反动气焰嚣张，大肆扼杀民主，他们在学术上捧出一些人物，企图在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道统宣扬“空虚玄学”，让人脱离实际，走向玄虚。杜国庠及时写了《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等文章，剖析新理学，认为这种哲学是“教人安分守己，不以贫贱得失介意，‘即以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一样地也可以作到圣人，便在精神上麻痹被压迫者，而松懈其斗争，直接地替压迫者维持其腐败残酷的统治，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革新。”

杜国庠这期间在学术思想史这一广阔领域里的辛勤探涉，为他后来写作《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和与侯外庐等合著《中国思想通史》，作了扎实的准备。其中部分文章，后来辑成《先秦诸子批判》一书，解放前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

八

1945年9月重庆谈判期间，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驻地接见了杜国庠，杜国庠把自己入党以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并得到毛泽东的鼓励。

1945年冬，杜国庠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担任《自由导报》总编辑。《自由导报》是重庆中小工商业界的喉舌，中共南方局很重视它，并安排了杜国庠、许涤新等参与该刊的领导。杜国庠把握好办报方针，认真审定每期稿件，还为该刊写了好些重要社论，使《自由导报》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反对官僚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发挥了战斗作用。

1946年春，杜国庠与侯外庐、陈家康、赵纪彬在重庆中苏文协楼上，一起拟定了编写《中国思想通史》的初步计划，决定用新的观点，来清理贯穿于数千年的思想史。就此形成了《中国思想通史》的最初构想和合作方案。

不久，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上海，杜国庠随机飞沪。杜国庠以文化人的身份，从事研究和著述。7月间，他集中精力，用1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自孔子到韩非子，即从春秋末叶到战国末叶儒、墨、道、法、名几家重要代表者的思想，作了精湛的研究和论述。他说：“大凡在思想史开端的时候，各家的思想无所不包，从哲学到政治，从修养到教育，并没有专门化，也不可能专门化的，除了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所限制，他们在主观上都想以‘其学易天下’，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如果用‘纯哲学’的眼光去衡量他们，结果必然要失败。窥得一斑，失掉全豹，然而他们都有

各自的哲学做他们思想的基础，不过不是那死板板的学院哲学罢了。”他总结出在思想史开端时刻诸子思想无所不包的这个特点，是非常精辟的结论。他发现诸子思想相互之间，对于“先行的及并世的其他派别的学说，不能不有所批判”，在批判过程中，“批判者也受了被批判者的影响”，“使自己的思想体系染上了对方的色调”。“就这样，整个先秦诸子思想，在客观上现出了一种好像有机的组织的样子——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家和家之间，派与派之际，有着某些斩不断的葛藤。”这是他运用辩证规律研究古代思想史的一个典范。

1946年9月，经郭沫若介绍，杜国庠到黄炎培所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担任教授。1947年3月，又和侯外庐一起负责《文汇报》副刊《新思潮》的主编。《新思潮》正面宣传马列主义，又针对当时思想界流行的一些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对于在敌伪统治下窒息了8年之久的沦陷区人民群众来说，《新思潮》所宣传的正确思想和理论，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从1946年底到1948年11月的近两年时间里，杜国庠的生活十分清苦，他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的有关部分，还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带有指导意义的见解。这三卷书，于1949年以前先后在上海出版发行。

杜国庠在上海期间，还遵照党的指示，在民主人士与工商界上层分子中开展统战工作。叶圣陶、郑振铎等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他去接洽的。

1948年冬，随着淮海战役进入高潮，上海国民党当局对进步人士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党组织及时安排杜国庠转移香港。抵港后，杜国庠在达德学院执教，并继续担任《文汇报》（1947年夏从上海迁往香港）副刊《新思潮》和《大公报》《哲学》周刊的主编。